

王晖方志论文选

岳西县地方志办公室

2001年6月



王 晖 自号大别山人。先后毕业于安庆师范学校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方志专业。副编审。现任岳西县志办主任兼总编、省方志学会学科带头人、省禅学研究会理事、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从事过教育、文化、党史、方志工作。1976年开始发表歌曲等作品，古今中外，涉笔成趣，在国家和省市级出版物上发表文学、摄影、音乐、历史、宗教、党史、方志等方面作品100余篇(幅)。其中文学代表作有研究歌德的《情海里飞出的歌》载《名人传记》89年第9期；电视剧本《铁蹄下的将军》连载于《志苑》99第5期至2000年第1期。历史学有《汉武帝登潜之天柱山考辨》载《历史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研究《四库全书》系列论文载《广东史志》97第1期、《湖北史志》97、98等期。宗教论文有《大祖禅师慧可考》载《法音》94第4期，获96省统战理论优秀成果二等奖，被收入《现代论文选》等多部大型文集。党史有《战斗在皖西的特委会》载《安徽党史通讯》82年第1期，被收入《皖西革命回忆录》等5部党史专集。方志学论文发表后仅获奖的有《系统控制志书分量》获93省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论方志性质》获中国地方志89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方志功能辨析》获91全国性地方志理论“神龙杯”三等奖；《历史文化名城志编纂》获97省优秀成果三等奖；《论方志学科建设的基本要素》，获99省优秀成果一等奖；《新编地方志工作的艺术总结》获省99学术年会三等奖。并多次获市县科技成果奖。担任编委并参编《安徽人物大辞典》。主编出版《方志性质辩论》、《岳西县志》、《岳西县志评论集》和《岳西县乡镇简志》，其中《岳西县志》等分别获省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三等奖。主编待出版的有《司空山志》、《岳西文史》。多次出席全国和省学术会议，2000年7月出席全国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并随团出国考察俄罗斯海参崴市。其传略被收入《安徽省高级专家辞典》、《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等十多部高级专家人物辞书。业余爱好曾是摄影迷、舞迷和电脑发烧友。

(摘自《岳西报》2000年8月22日第4版，原名《岳西文化人王晖》)

序

20世纪90年代初，在方志界老前辈的奖掖支持下，我出版了一本《方志性质辩论》小集子，约请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郦家驹作序。郦老当时是全国方志界实际工作的最高组织者，他说从未答应过给方志界任何学者的专著作序，破例唯一给我的小集子作序，因为这个课题重大，同时是他鼓励我从事这项研究的。郦老的这一厚爱着实让我荣幸至极，但也后悔不已，悔不该去惊扰郦老。因此汇编这本《文选》，尽管方志界知名的专家学者我都认识或有过书信往来，然而再也不敢请人作序装潢门面了，还是自己抖抖心事吧。

为了总结首届修志的理论成果，安徽省方志学会去年通知全省方志工作者，将发表的论文复印送省，结集出版。于是我筛选了十几篇，复印成册上报。由于我的论文篇幅较大，有的一篇就有1.7万字，因此十几篇的复印件装订起来就象一本书。后来省学会结集未果，我又扩大了选择面，共收录34篇，结成这本个人的《方志论文选》。我不想取个什么抽象的书名，直言《文选》，因其文章是从我参加修志以来发表的百余篇各类文章中选出来的。标准是对新方志学建立有一点参考意义的，对未来修志实践仍有一点指导意义的，对史志资料的考证有一点借鉴意义的，鉴于这三点，哪怕是与人合作的作品也收

录其中，除此之外只好忍痛割爱了。

入选的文章基本上是我方志观点的代表作，共分四大类，第一类“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偏于理性，逻辑性强，较适应于方志理论工作者；第二至第四类，是关于方志编纂、方志评论和方志资料方面的研究，偏于实践性和可操作性，适应于方志实际编纂工作者。坦率地说，总体上很具有“大别”的特点。所谓“大”，即选题重大，如方志性质与定义、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方志学方法论、方志学科建设、方志功能、《四库全书》方志提要中的方志观、网上方志……这都是方志学研究中首要和重要的课题。所谓“别”，即观点别具一格，从不人云亦云，以逻辑为工具，把方志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分析，力求抓住本质，使之出现突破性进展。如方志性质的观点，1989年在第四次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年会上交流时，产生轰动效应，1990年《中国地方志》第一期重点推出后，在全国引起一阵方志性质热，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朱文尧先生说我是方志性质争论的发起者（应指80年代末），使这个课题的研究“从现象定义进一步到本质定义”。尽管这个课题的研究出了专集，为了完整的反映我的方志观，还是将这篇原作收入《文选》中，因为这是个伴随方志事业始终的一个课题，以便供来者研究时参考。类似这样独特的观点还很多，如方志功能、志体的发展方向——书+软件体等，目前还是独步志坛的观点，能走多远，那得听从广大读者的裁判和时间的检验。

我在方志理论研究中，选大题，作长篇论述，几乎形成后来的写作习惯。但是写文章既不在多，也不在长，也不在发表的刊物级别高低，关键在立说，有思想，人是靠思想站着，文章也只有靠思想永存。正象有的人著作等身，但后世没有人研究它；而有的人只有一两本书或一两篇文章，可世世代代都在

啃它。有鉴于此，我把那些一事一议，对修志还有指导意义的短文以及对历史、宗教、人物的研究有着重要参考意义并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论文也收入其中，想必不是多余的。

我于1983年参加修志工作，至今有18年了。1995年被省方志学会推为跨世纪方志学科带头人，虽然以论文入选三次代表安徽省出席全国学术研讨会，省里三次评奖，我次次都得一等奖，还得过全国性的以及其他学科的奖项，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我深知个人的作用十分有限，与“带头人”的头衔是极不相称的。限于自身的条件和能力，我目前还不能将过去发表的文章优化重组，写出系统性的专著来，只能汇个零散的集子，算是我18年修志的一个小结，也算是“带头人”向学会了交了一份答卷。上一次出的《辩论》文集，《中国地方志》副主编刘永平先生说认认真真读过三遍，并称赞很有价值！感动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本《文选》的出版我没有此奢望，如果有哪位朋友读其一二，并指出谬误，也就谢天谢地了。

大别山人

2001年2月

目 录

序..... (1)

一、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

论方志学科建设的研究主体和客体..... (1)

方志学方法论..... (11)

论方志性质..... (23)

《中国地方志协会1989年学术年会纪要》摘要..... (44)

方志定义中的“古今”析..... (48)

方志功能辨析..... (52)

再论方志性质..... (59)

《四库全书》中的方志观探源..... (72)

续志类型界定和运作机制..... (80)

志体的发展方向——“书+软件体”..... (90)

二、方志编纂理论研究

系统控制志书分量..... (96)

志书寓意法探讨.....	(110)
志书索引编纂谈.....	(116)
志书行文慎用“工程”一词.....	(121)
军事志几个共性问题的探讨.....	(123)
再论军事志几个共性问题.....	(128)
历史文化名城志编纂四宜.....	(137)
论社团志.....	(142)
更新观念写“两大失误”.....	(150)
论政治运动入志.....	(158)
当代修志“左”的影响概说.....	(166)

三、方志评论

理论与情趣并重 思想共文采焕然

——读《董一博方志文集》.....	(169)
-------------------	---------

“春色”与“伤心”并处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安徽省毛尖山水电站志》序.....	(177)
----------------------	---------

一串酸甜红葡萄

——评《泽普县志》.....	(181)
----------------	---------

佳志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评《霍邱县志》.....	(187)
----------------	---------

案例入志 可读可鉴

——评《贵州省志·审判志》.....	(193)
--------------------	---------

新编地方志工作的艺术总结

——评长篇小说《倒影》.....	(200)
------------------	---------

《四库全书》中的方志提要赏析.....	(209)
---------------------	---------

生存的形象 发展的方向

——全国各地建立方志馆情况调查..... (216)

泪水浇灌成功的花

——《岳西县志》获奖杂谈..... (220)

四、史志资料研究

大祖禅师慧可考

——兼论慧可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225)

僧璨大师生平与《信心铭》新探..... (240)

岳西县名新考..... (252)

王步文自挽置疑..... (256)

汉武帝“登礼潜之天柱山”考辨..... (260)

论方志学科建设的主体和客体

方志学科建设是一门具体科学研究，又是一门与多学科交叉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一种探求未知的理性创造活动。这种活动必须具备研究主体、研究客体和研究工具三个基本要素。方志学研究主体是指广大方志理论工作者。方志学研究客体是指方志学科的性质和它的研究对象。方志学研究工具即是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称方志学方法论。这三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如何把握方志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要素，这是一个理性较强的大课题，本文重点谈谈关于研究主体和客体的认识。

一、方志学研究主体

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方志学研究活动和方志记述的对象都离不开人。但是，新编地方志以来人的主体意识并不强，这不仅表现在方志记述中大量出现见事不见人的现象，在方志学研究中也常常是见论不见人，如方志界的学术会议纪要就可见一斑。文化艺术界往往一篇小说、一个角色、一首歌就可以使作者成名或成家。方志界虽然不能那么浮躁和浪漫，然而系统研究有成就的方志学者及其理论成果，充分认识方志理

论工作者的层次性和互补性，培养和造就新人辈出的方志理论队伍的工作实为方志学科建设之必要。

回顾新编地方志之初，对旧方志学研究主体是非常注重的，因为学问是人提出来的，我们谈起旧方志学开口戴震，闭口章学诚。尤其谈起旧方志流派，无论是“纂辑派”、“撰著派”，“尚繁派”、“尚简派”；还是“地理派”、“历史派”……都必然论及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在新方志学研究活动中，由于理论尚不系统完善，新方志“千志一面”的现象较为普遍，方志流派尚未形成，因而对当代方志学研究主体涉及较少，偶而涉及的也往往存在“官本位”思想，缺乏学术民主化。近年来，开展志坛诸老方志思想研究，出版《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等，使当代方志学研究主体的研究开始步入新方志学科领域。

人作为方志学科建设中的研究主体，他不仅是方志学的研究者，而且又是被研究者，所以人又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体。研究当代方志学研究主体有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发现人才，保护人才，造就人才，尊重人才，启用人才去承担方志学科建设的任务；二是从方志学研究主体入手，便于了解和利用优秀的学术成果，为方志学科建设服务。《黑龙江史志》曾辟有方志学者谈自己方志观的“自鸣园地”专栏，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当代方志学研究主体中，已有人亮出“学派”的旗帜，但是其“学派”的理论特色是什么？还难以说出一二。有人曾将当代方志理论工作者分为“学者型”、“领导型”、“地方志实际工作者”（1）三种类型。这种划分不甚科学，因为“学者型”与后两种类型有交叉，比如在“领导型”中列出的第一个人物梁寒冰，虽然他是位领导者，但他更突出的是一位学者。同样，“地方志实际工作者”中也有学者。我认为当代方志理论工作者因所处的工作环境、学术氛围和实践程度的不

同，研究的对象（客体）和方法（工具）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方志学研究主体中的地位和派别，这样可以分为三个派别。

（一）学院派

该派是指全国高等院校中研究方志学的专家学者。学院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学者，他们研究方志学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在清代以来，方志学逐渐形成历史学的支流，所以在新编地方志之初，历史学者们成为方志学研究的先头部队。他们研究的对象是旧方志，采用的方法是历史考据法，形成的理论偏重于方志史、方志学史，所阐述的方志学基础理论和方志编纂学理论大部分是对旧方志学的继承和演绎。

学院派的另一类是地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与方志学有关的多学科专家学者。这些学者研究方志比历史学者起步晚，他们以本学科知识为研究工具，采用交叉研究的方法，研究新编地方志中相关的专业志，其理论成果对创新志体，解决志中专业技术性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院派集中了一批资深的专家学者，他们富有编书的经验，又善于发挥“名人效应”，联手合作，所以学术成果系统丰富，尤其在1985年以前，该派基本上主宰了方志理论阵地。毋庸讳言，该派由于本身没有修过志，也没有直接遇到修志实践中发生的问题，所以形成的理论实践性、操作性不强，特别是早期的成果，观点有些陈旧。但是，学院派为普及方志知识、培训修志人员、评审志稿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所采用的历史考据法、交叉学科研究法，仍然是今天适用的研究工具。

（二）指导派

指导派可分三类：一类即以梁寒冰、董一博、陈元方、邵文杰为代表的方志工作领导者。他们在组织新编地方志工作中，发表了大量的谈话和论文，即便是谈话也不是一般行政工作性质的，而是专业理论性的。他们研究的对象一般偏重于宏

观政策性的问题，对修志工作具有决策性的指导作用。

指导派的第二类是全国和各省、地、市地方志办的直接从事修志业务指导的人员。这类学者间接参与修志活动，接触了不同志种的编纂实际，采用比较研究法，专门研究志书和志稿中一些不完善的问题，产生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志学理论。

指导派的第三类是方志刊物编辑。他们在组织文稿、编发指导刊物的工作中，间接研究大量的志学理论信息，归纳各家言论，并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与此同时，形成了自己的方志观，以超脱的姿态，对志学理论进行软着陆，以刊物书面形式对修志工作起着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由于他们本身就控制了方志理论阵地，同时又具有全方位窥视研究动态的优势，所以他们研究的特点是角度新、出产快、成果多。

指导派虽然本身也不修志，但他们研究的对象紧密结合实际，取之实践，利用“沙盘战术”寻找最佳方案，服务于实践，由此产生的理论对于组织实施方志工程、完善志体、指导方志编纂、发展方志学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修志派

该派是指直接从事修志工作又进行理论研究的方志工作者。他们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修志实践中得出直接经验后，完成第一次飞跃，写出编纂实践性文章。其方法是经验总结性的较多，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属于“经验方法”。当然，也有一些经过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之后完成第二次飞跃，形成“理论方法”与“实践方法”相结合的高层次的理论文章。

修志派是方志学研究的生力军。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修志实践是理论的前沿，是方志学的根据地。修志者因工作技术上的需要，必须研究和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和难点，问题是学问的来源，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

一半；难点是理论的生长点，解决难点就是一次学术上的突破，因此修志派在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克服难点的反复实践中，得出真知灼见。尽管修志派的理论成果多半来源于直觉思维，抽象性不足，还未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但它毕竟是来自实践中的一块璞玉，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开发价值，比那些纸上谈兵，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文章要实在得多，只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锤炼，将成为建构新方志学的基本依托。

从上所述可知，当代方志学研究主体三个派别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具有互补性。方志学科建设必须依靠三者结合的研究主体，不可偏颇任何一方。任何一门学科建设都是把追求真理性视为最高目的。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古代方志学研究主体基本上都是直接修志者，理论与实践是统一的。当代社会信息发达，方志学研究主体间接修志或不修志的占去了不小的成分；而那些经过十多年修志实践摔打出来的生力军，由于受人才机制、出版经费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很难在方志学科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甚者流失改行，这不能不认为是方志学科建设中的一大损失，不能不引起方志界重视。我们现在研究方志学科建设，其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加强方志学研究主体的建设——即方志理论队伍的建设，珍惜十多年的修志代价，合理配置人才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实践的决定作用，让实践的因素渗透到方志学研究主体的各个阶层中去，努力使方志学科真正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从而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统一。

二、方志学研究客体

方志学研究客体是什么？也就是说方志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是近几年方志学界争论激烈的热门话题。1989年全国地方志学术年会上，有位代表提出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地方”（4），这个观点在小组讨论中就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我是反对者之一。1993年学术年会上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1994年，主张者提出“方志学是研究认识和表述一定区域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学科。”（5）1995年，继而提出“方志学就是关于认识和表述区域发展的学科（6）。”1996年，又相继提出：“以认识和记述一个地方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为研究对象。”“方志改革从理论入手，将以地方志为研究对象的方志学，改为以认识与记述地情（区域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方志学（7）。”提法年年翻新，其含义是相近的，即“地方——地情——区域发展”。这样一个一直带有强烈异议的命题，为什么能够始终在流行？说明此课题研究的复杂性，也说明研究者缺乏科学的研究工具，抓不住事物的本质，以至破无力度，立无基础。

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只有两种说法，一是以“地方志……为研究对象”，具体表述有所不同，其核心内容基本上是方志界的共识。二是上文所述的“以认识与记述地情（区域发展）为研究对象”，此说主张者不多，但论说连篇累牍，颇有独步志坛之势，因此确有必要重点探讨之。这里以逻辑学与哲学知识为工具，试作两点论述。

（一）遵守逻辑同一律，防止混淆概念

如果用逻辑方法来分析方志学研究对象是“区域发展”（包括地方、地情）的观点，我们可以直接得出这样无情的结论：主张者混淆了概念，思维活动违反了逻辑的同一律。

我们探讨方志学科的研究对象，本来讨论的是“方志学”的属性问题。“区域发展”说主张者把方志学理论工作当做方志编纂的实际工作来考察，把“方志学”的属性当成“方志”的属性，我们说方志是记述区域发展的一种科学文献，方志编纂是认识和表述区域发展的工作，这都是基本正确的。但把方志学这个由方志派生出来的学科理论问题，当做方志和具体工作来研究，认为方志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认识和记述地情（区域发展）”的那就不自觉地偷换了概念，违反了逻辑的同一律。按照这种错误的逻辑推理，研究不同的地情和区域发展，就会形成不同的方志学——区域方志学，这种把方志学研究与区域发展研究相提并论，那么研究安徽区域发展，就要形成“安徽方志学”；依此类推，研究延安的“延安学”就可改称“延安方志学”；研究香港的百年沧桑，那就是“香港方志学”；反之亦然，我们研究中国方志学，那就要去研究中国地情和中国发展的这个大课题；换言之，也只有研究中国地情和中国发展的问题才是研究中国方志学，方志学科有这个任务吗？

我们可以这样断语：方志是有区域的，方志学作为一门科学是没有区域的，二者概念不可混淆。

（二）以哲学理论为指导，准确把握方志及方志学科的本质属性

方志的本质属性是什么？1989年全国地方志学术年会重点讨论了此课题，并找到了逻辑的起点，取得了重大突破。八年来，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但各家的概括是相近的。一种说法是：“方志是记载特定区域特定时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我觉得这种表述除了少许不够妥帖之外，最主要的是不够通俗流畅。当年我在《论方志性质》一文中较为抽象地提出一种说法是：“方志是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情况的科学文献（8）。”本文姑且不论孰是孰

非，但从两个性质定义的属概念来看，“著述”也好，“文献”也罢，两者共同肯定的方志属性是一种意识载体，是一本“著述性”、“文献性”的书籍。由“方志”而派生出来的“方志学”的属性当然是研究方志这类书籍的形成与发展的，而不是研究什么“区域发展”。为了进一步阐明问题，我们不妨将它与历史、地理这两个相近学科属性进行比较研究。

历史、地理是两门古老的学科，同时也是方志的母学科。方志之所以能从历史、地理脱胎而出，是因为它们已随科学的发展，各具独特的科学属性。相比较而言，方志的概念内涵具体，“志者，记也，”着重是指一种性质的书。而历史、地理的概念比较宽泛，除了指某种性质的书之外，更重要的是指一定时空的物质现象。例如历史的本质属性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地理的本质属性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环境”。从哲学意义上说，历史与地理的属性偏重于物质现象，方志的属性偏重于意识现象。譬如说以香港回归为话题，我们就可以作出这样一组判断：

谈香港的历史，必然是介绍香港的“发展过程”；
谈香港的地理，必然是介绍香港的“自然环境”；
谈香港的方志，必然是介绍香港的地方志书，并非介绍香港的“地情和区域发展”，否则就滑到其他学科中去了。

进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组学科属性定义：
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即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科学。

方志学是研究地方志形态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

（三）方志学研究客体的组成部分

方志学研究客体与方志学研究对象、方志学科体系是同一的，它是由方志学科的属性所决定的。“方志学是研究地方志形态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这是方志学科属性与方志学研究

对象的完整表述，尽管与众多说法稍有不同，但由于这个定义的内涵比较抽象，外延丰富，那些不尽相同的说法完全能够囊括其中。

方志学科建设的体系本身就是方志学研究客体，它的组成部分论述者众多，姜万成同志归纳各说，曾将方志学科体系绘成一张示意图，第一层次把方志学划分为：“普通方志学、专科方志学、应用方志学、方志文化学、方志史学（9）”五大类，下面的分支近50门，这种设想是积极的，能否成立尚待在实践中去完善。我的观点目前比较现实的提法是方志学科可分为：“方志学基础理论（或曰基础方志学、方志学概论）、方志史学、方志编纂学、方志资料学、方志目录学、方志批评学、方志应用学、方志管理学、方志收藏学、方志人才学（即方志学研究主体——方志学者）……”其中“方志编纂学”又可分支为：“行政区域志编纂学（包括省、市、县……志）、自然实体志编纂学（包括山、江、河、海、湖……志）、社会实体志编纂学（包括厂、所、院、校……志）、建筑物志编纂学（包括楼、阁、亭、塔……志）、专业志编纂学（包括土地志、宗教志、军事志……既可综合研究，也可专门研究，如教育志编纂学）”。

总之，方志是一门大学问，随着学科建设的深入，方志学研究客体还可以继续分支发展。

理论落后于实践，是本届修志工作的一大特征。广大修志工作者经过十多年的艰苦跋涉，如今已迎来了丰收的季节，加强方志学科建设，改变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状况是面临当代修志者们的一项紧迫任务。十多年的丰富实践已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主体，提供了崭新的研究客体，这些优秀的研究主体运用先进的研究工具，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作用于新的研究客体，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方志学科定将以伟岸的姿态傲